



往事

朱树诚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44.62

ZSC



往 事

朱树诚 著

责任编辑：张先瑞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（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：410006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9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1.375

字数：232,000

简易精装：ISBN 7-5404-2155-x
I·1643 定价：17.0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04.02
3.00

目录

第一辑

- 往 事/3
401 室住客/19
人物二题/34
我爱这一行/48
山 路/61
小旅伴/70
买 伞/77
学 犁/86

第二辑

- 复 学/97
心 祭/100

往
事

- 常青树/107
登攀/118
瑞雪兆丰年/125
我实在应当说声谢谢/134
丁玲的乡情/138
山道上的足迹/143
春雨潇潇悼康老/150

第三辑

- 叶蔚林和他的小说/163
执着探求命运轨迹/169
学者与小说/172
唐浩明和他笔下的历史人物/175
《曾国藩》与历史小说热/177

到这里来检阅“湘军”/179

一点杞忧/183

为人作嫁也光荣/192

树与林/194

关于《千家词》的编选/197

第四辑

马尔可夫过程的探索/201

招才进宝/214

路漫漫/237

春风快绿江南岸/257

有志不在年高/285

目标/295

风雨兼程三十年/310

一首诗，在中国……/344

后记/356

往事

第一辑

往事

有人说，生活常常像一个大迷宫；你东跑西颠，劳神费力，闹腾了半天，睁眼一看，又到了原来的地方。这不，眼下迟永年就呆在他四十多年前呆过的办公室里，只是当年的行政科如今改成副市长办公室了，三屉小办公桌换成了水曲柳桌面的大写字台——他成为这张写字台的主人已整整三天了。

三天了，都干了些什么？三天开了六个会：计划生育问题，大男人女问题……没有一个不是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。这一下午争了个你死我活，展览馆的归属问题还没有定下来。王市长怎么说的？明天上午接着开，原班人马，一个不缺；迟永年当然还得去。可他去干什么？看他们吵架，看他们争一个唾沫横飞、脸红脖子粗么？熟悉熟悉情况。有必要熟悉这些情况？三天前刚在这张写字台前坐下时想过的那个问题又冒了出

米：这步棋只怕是走错了，放着轻车熟路的专业不干，来当这个招风现眼的副市长！是这块材料么？过年就是五十岁的人了，知命之年啦，怎么老王一鼓动就热血沸腾起来了呢？真是，三天了，照他眼前这劲头，一栋楼的设计草图就出来了，那多实在，一笔下去，就是一堵墙，一根柱子……是不是应当找老王谈谈——真应当感谢老王：提前二十分钟散会，使他终于能有机会静下来好好想一想。

好安静啊。这地方比起他在城建局那一天到晚响着嘈杂的人声、刺耳的汽车喇叭声的办公室来，真有天壤之别。五十年代早期的一些建筑物隔音性能就是好，只是墙太厚，显得笨重，又费材料，肯定造价高，好在那时候材料便宜。瞧这门、这窗，三十好几年了，严丝合缝，一点没变形，这木头不仅材质好，肯定还是经过严格处理的……他用一个建筑师挑剔的眼光，转着圈朝四面打量时，目光在靠阳台的落地窗边停住了：一个人！一个五十几岁的女人，正蹲在那里擦玻璃，默默地，一片一片，擦得那么认真，那么仔细，常常伸出指甲剔玻璃上那不易擦干净的一些小斑点。她的神情是那样专注，仿佛这世界上除了这几块玻璃，一切都不存在。她的粗糙多皱的脸上，泛着一丝淡淡的安详的微笑，映着玻璃的反光，脸色显得格外明朗。一个艺术家的传世之作将要完成的时候，大概也只能是这种神情了。可是，这是擦玻璃的时候吗？离下班不到十分钟了。这屋子以前好像都是上班前打扫的，每天上班时，水曲柳桌面上还留着一种刚刚擦拭过的湿润和清凉，叫他感到舒适和愉快。今天是怎么回事，刚才怎么没有发现她？是自己没有注意，还是她早在外边阳台上了？

刚才自己把门摔得那么重，好像还叹过气的，她发现了自己的失态吗？

他像无意中让人窥见了什么隐私似的有些烦躁起来。他不愿意去惊动这个上了年岁的女工，反正快要下班了，也做不成什么事情。何况她的劳动，她劳动时的这种神圣的感情，都是应当受到尊重的。他忍不住又看了她一眼。大概是凭着第六感觉，她已发现有人正在看她，也掉过头来，两道目光刚巧碰在一起。她的眉毛扬了扬，嘴唇也动了一下，像是要搭话的样子。这都只是一瞬间的事。她看见了他的不满和冷漠，立即垂下了眼睛，脸上的笑容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似地骤然消失了。她利索地收拾起抹布、扫把，拎起铁皮水桶，一声不响地走出去。她走得很快，脚步也很轻，没有一点声音，也没有一丝慌乱，像大医院里那种训练有素的老护士。到门口，她从容地放下水桶，腾出手来拉开门，走出去，再回过身来关门，像有些歉疚地又看了他一眼，倒让迟永年有些过意不去起来。门终于关上了，门擦着门框，吱吱地响，活像一声压抑着的深沉的叹息。

迟永年已经无法再继续刚才的思索。他看看表，站起来收拾书包。刚才那个清洁女工的身影还在眼前晃，那眉眼，那微笑，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。三十多年了，这楼里应当还有些他熟悉的人的。她是么？是谁？突然，一个名字像电光火石般在眼前一闪：任珍？珍大姐！真的是她么？真的是她？

下班铃声像是秘书小周带进来的。她告诉他，车在门口等着。他才想起来，还要去陪外宾吃饭，吃完饭还要回

他们一起去看演出。他走出门来，不无懊丧地朝那个清洁女工离去的方向望了一眼，无可奈何地朝小车走去。

他终于证实了，那人就是任珍。昨天晚上在回家的车上向小周打听来的。

“机关里过去有个叫任珍的同志，不知道还在不在？”

“在呀，下班前好像还上您办公室去过。”

“呵——”虽然早有准备，但他仍像叫火炙了一下似的，一个字脱口而出，悠长而又轻缓，像长长地嘘了一口气。很久很久，才慢慢地自语道：“都没认出来。老啦，都老啦……”

机灵的小周发现了副市长情绪的变化，掉过头来，忽闪着一双睫毛很长的大眼睛问：

“您同她很熟么？”

迟永年点点头。

“听说您三十年前就在咱们机关工作？”

迟永年没有说话。他瞥了小周一眼，像没有听见她的问话似的，双手抱在胸前，慢慢地合上了眼睛。他知道，一个刚刚提拔上来的副市长，引人注目的程度不下于一个刚刚唱红的歌星，一件小事，一个习惯动作，甚至一句口头禅，都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而在这种谈论中，苍蝇常常会变成大象的。据说，关于迟副市长，已经有一些真实的和虚构的或者虚实结合的故事在不胫而走了。真叫人哭笑不得。

汽车一直把他送到家里。他几乎一夜没有合眼。打从小周证实了那人就是任珍那阵起，他就恨不得给自己扇两个耳光。你怎么能认不出来呢？都三十多年了。三十多年

怎么的？人老了。老了怎么的？珍大姐不是把你认出来了么？她有思想准备，她准早听说了副市长叫迟永年。你不是也有思想准备吗：你知道这里有个茶炉工叫任珍，早几年刚回市里时，你还来这里打听过她的。那时她没回来，还在乡下，等着落实政策。可你应当知道她会回来的，一回机关你就应当去看她。怨忙，怨开会，三天开了六个会，但总还不至于连一隙儿空闲也没有吧？他记起她那眼神，亮得像一苗火焰，还有那扬起的眉，咧开的嘴。她是要同自己说话哩。三十多年了，该有多少话说啊！准是让自己那不快的、冷漠的眼神给呛住了。唉，珍大姐，她会怎么想呢？她也会说“为人莫做官，做官一样官”么？不会的，珍大姐不会这么俗气。

是的，她应当了解他。他们认识已经有三十多年了，那么早，那么久。那时，他才十七岁，刚参加工作，在行政科当公务员。

人都说年轻时的事记得真。可不，一幕幕像电影似的留在眼前，每一个细节都这样清晰。那天他去打开水，把水瓶放好，刚要拧龙头，就听见有人招呼他，声音清脆，响亮，唱歌一样的好听：“你等等，刚对了凉水，还没开哩。”

他扭头一看，一个姑娘正抱膝坐在墙角落里，向他甜甜地笑着，细细长长的眉毛，眉眼弯弯的，显得秀气，讨人喜欢。

“我是新来的，叫任珍。老田师傅调传达室去了。”

“哦。”他轻轻应了一声，抬眼打量了一下屋子，怪不得这茶炉房今日清爽多了，铜茶炉擦得锃亮，透出好看的

紫红色来。往日满是煤灰水渍的地板也认真扫过，显得一尘不染。

“水还要一会才开，你先坐坐。”她又说话了，拍拍旁边的一条小板凳，“我认得你的，你叫迟永年，他们都叫你小迟，对不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不告诉你。”

她红着脸笑笑，递给他一把南瓜子。这瓜子真好，黄澄澄的，又壮实，又整齐，他连嗑了几粒，不由得赞叹说：“真香！”

她笑了，说：“你吃吧，多着哩！”

她指了指茶炉顶上，果然满满地焙了一层南瓜子，怪不得远远地就闻到一股甜丝丝的香味。

一会，她从旁边的小屋里拿出来一块刨光的小木板，一支毛笔，说：“求你给我写几个字，一面写‘没开’，一面写‘开了’，挂到茶炉上，我要不在，大家也明白。”

迟永年笑了，在木板上写了“已开”、“未开”几个字，并告诉她，这同她说的一个意思。

任珍脸红了，认真地问：“都一个意思，都是四个字，怎么不照我说的写？”

这一下把迟永年难住了，想了半天，才说：“大家都这样写，大概是书本规定的。”

她轻轻“哦”了一声，秀长的眼睛里透出一丝淡淡的忧郁来。后来他才知道，她比他大两岁，从小在地主家做丫头，认识的几个字还是跟土改工作队的大姐们学的。

过了不久，机关成立团支部，任珍当选为支部委员。

那时候的年轻人多单纯啊。白天各人忙各人的工作；晚上，除了开会、过组织生活，人家常聚在一起。冷天就在任珍那间茶炉房的小屋里，又干净，又暖和；热天，就在茶炉房外面的葡萄架下，一边嗑着南瓜子，一边天南海北地扯谈。多么难忘的夏夜啊，大家常常望着满天的星斗，望着弯弯新月边缠绵留连的几朵云彩，默默地想着心思，任萤火虫在身前身后闪烁。偶尔有一颗流星飘过头顶，在天幕上划出一道好看的弧线，然后消逝在遥远的天际，这时，任珍常常会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：“又一个人死了。”她有时也告诉迟永年，老辈人说的，天上一颗星，地上一个丁。迟永年批评她唯心主义，她总是羞涩地笑笑，不再言语。

任珍人勤快，常给年轻的同事们洗衣服。迟永年的洗浆缝补，更是全由她包了。每到星期天，一洗两大盆。迟永年倒也好，不会洗，常在一边陪着，瞅空子帮帮忙，打打下手。那时机关里还没有自来水，用水要用吊桶从井里打，是个费力气的事，迟永年也全包了。水不用经常打，闲空时就站在一边，陪她说说话。任珍认字不多，看不来书报，迟永年就常常给她读一些书上报上看来的新鲜事，常把她逗得格格地笑。

后来，机关里办开了舞会，迟永年成了积极分子，也动员任珍去。她总说：“我笨，学不会。”有一回，她偷偷跑去看了一回，没三分钟就跑了，跑出去半里地，脸上还火烧火辣的，心还在怦怦地跳。第二天，迟永年知道了高兴地问她：“你去看跳舞了？”

她勾着头，脖子红得像熟虾，一声不出地搓着衣服。

“你也学学嘛。”

“丑死了。”她仍勾着头，声音很小。

迟永年笑了：“真封建，还是困干哩！”

“反正我做不来……”听声音像要哭了。迟永年没敢再逼她。

任珍不愿跳舞，但她不反对别人跳。迟永年去跳舞，从茶炉房门口过，她总是给他抻抻衣服，然后塞一把南瓜子给他。

那时候的生活就这样无忧无虑。他们都庆幸自己遇上了好时候，以为就这样过上一辈子了。

第二年，省工农速成中学招生，机关里要选送一批年轻人去上学，有迟永年一个。迟永年不太愿意。自己不就是急着参加工作，才舍下了只差一年就能拿到的初中文凭的么？叫他放下这向往已久的革命工作，仍然回到课堂上去，他实在无法接受。打从通知那天起，他就眉毛打结，嘴唇噘起，气鼓鼓地像只蛤蟆，见谁也不爱理睬，机关里的同志好像都成了推他落井的仇人。科长找他谈话，没三句就崩了。两个字，一撇不多，一捺不少：不去！晚上，任珍来了，坐在他对面，笑咪咪地看着他：“叫你去念书，你不愿意？”

“你愿意，你去好了！”

她吓了一跳。他是第一次这么跟她说话。她笑了笑：

“你这不是成心气我么？要有速成小学，我就去！科长说，这是培养人材哩。将来建设社会主义，要文化高的人。你年轻，又聪明，前途大着哩。”

“……”